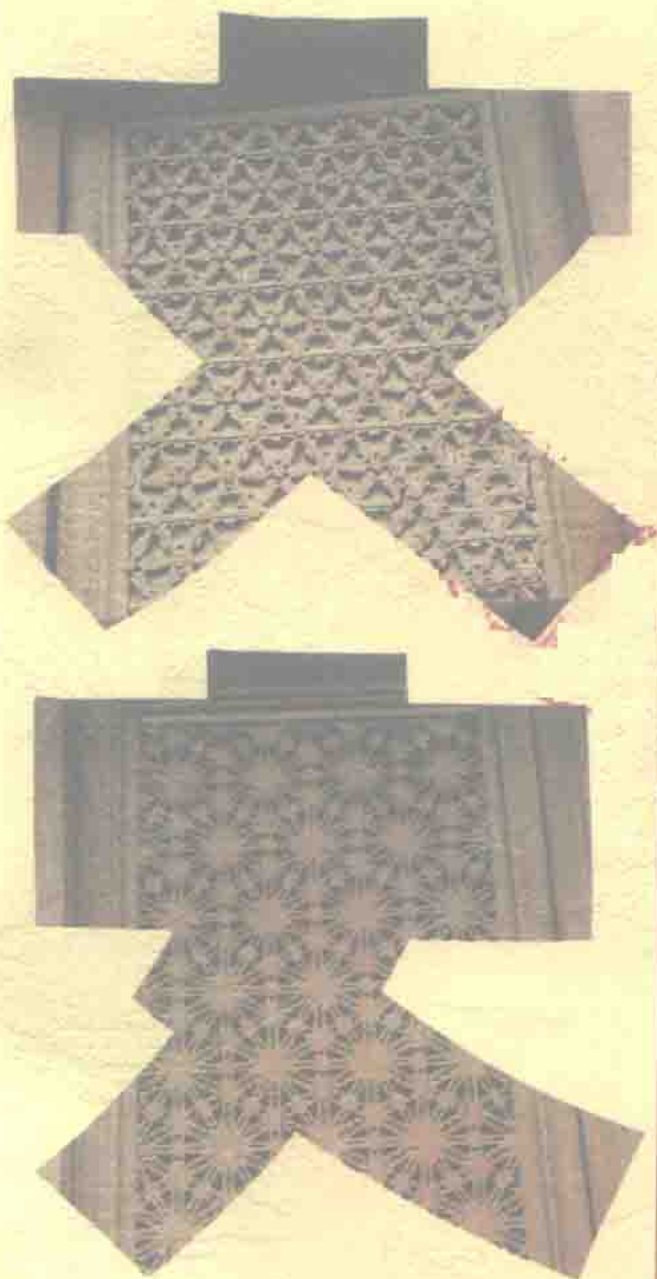


北京文史资料

第57辑



▲十年横祸

▲「文革」后期的一段往事

▲爱国女法学家纪清漪

▲潘汉年在国河农场

北京文史资料

第57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史资料 第57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8

ISBN 7-200-03393-6

I. 北… II. 北… III. 文史资料-北京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3888 号

北京文史资料

BEIJING WENSHI ZILIAO

第57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50 000字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00-03393-6
K·356 定价:15.00元

· 共和国脚步 ·

- | | | |
|----|-------------------|-----|
| 1 | 初进新华社时我的经历 | 叶 周 |
| 16 | 抗美援朝中的首都工商界 | 潘 怡 |
| 34 | 忆长津湖之战 | 黎国庆 |
| 41 | 大型歌舞《志愿军战歌》的创作和演出 | 刘汝舟 |
| 49 | 欢迎志愿军归国盛况 | 张 霖 |

· “文革”史料 ·

- | | | |
|----|-------------|-----|
| 55 | 十年横祸 | 严寄洲 |
| 69 | “文革”后期的一段往事 | 蔡瑶铤 |

· 人物春秋 ·

- | | | |
|-----|------------|-----|
| 79 | 爱国女法学家纪清漪 | 诸天寅 |
| 107 | 俞崇文烈士事略 | 张良琛 |
| 120 | 潘汉年在团河农场 | 阎 鹏 |
| 136 | 郭则沅传略 | 郭久祺 |
| 155 | “两吴生”的交谊 | 孙敦恒 |
| 173 | 缅怀教育家李建勋先生 | 冯国定 |
| 179 | 名医岳美中先生二三事 | 吕 中 |

· 校园风云 ·

- | | | |
|-----|-------------|-----|
| 185 | 燕京大学学生运动亲历记 | 陶 涵 |
| 198 | 怀念北京第一所工科大学 | 梁铭常 |

219 北平大学的机构和人事变迁

梁铭常

· 梨园史话 ·

223 菊坛联对掇拾

白宝华

241 波多野乾一和《京剧二百年历史》

靳 飞

252 一次为回民小学的京剧义演

马崇义

260 张春华空难逃生记

赵晓东

· 古迹名园 ·

266 关于牛街礼拜寺的“白匾”

刘东声

282 从皇家禁地到北京的第一座公园

钟少华

293 话说莲花池

刘仲孝

304 编者的话

初进新华社时我的经历

· 叶 周 ·

1948年11月，我从河北正定县的华北联合大学政治部调到劳动大学文化供应社。劳大是中共中央机关当时的代号，文供社是新华社的代号。由于傅作义部队从保定出发突袭石家庄，华北局机关都已转移，我背着背包，沿着滹沱河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走了两天，才在一个小村子里找到了华北局组织部的留守处。华北局派了一辆马车送我和华北人民日报社的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他们不满周岁的女儿去平山县。我在沿途的招待所登记簿上几次都看到余志恒的名字。原来她是总社派往华北联大学习后调回去工作的，她比我早一天到留守处，所以总在我的前面登记。

到达西柏坡村附近的韩家峪（当时属建屏县）山坡下已是黄昏。马车回去了，在上山路上，我遇到李绍逵（后来担任总社发行处长）。当我知

道他是刚疗养后回总社时，我就把他的背包也背在我身上出发了。

经人指点，我在韩家峪与陈家峪之间的半山腰一间不大的老乡房间里找到总社干部科。进屋一看，一个土炕占了大半间房，中央放了一张八仙桌和四把凳子后，空间就很小。两位科长丁拓和张纪明（后调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从门口的灶里盛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金黄色小米饭和一碗胡萝卜丝炒白萝卜丝。我饿了，吃得很香。

我被分配到对外部工作。对外部当时叫三部，部主任沈建图到西柏坡村去了，参加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的总社小编辑部工作。副主任陈龙坐在土炕上，一张小炕桌上放了一架手提打字机。他向我介绍了对外部的工作任务。他穿着一套灰色棉军服，领子敞开着，盘着腿坐在炕上，令人难以想到他是一名出色的英语干部。开始，我在对外部什么都干，取稿、抄稿、打字、作资料、编写战报或简单的解放区消息。我还兼任行政干事，协助行政秘书彭迪作一些具体事务，如领煤、发津贴（每人每月15斤小米）、发烟（有时是几包飞马牌香烟，有时是烟叶）。我还有两项特殊任务：一是在周末，要到老乡处临时号房子让分开居住的夫妇过“礼拜六”。我记得，每到周末下午，新婚不久的胡小为总是抱着被子，有点不好意思地咯咯地笑着，同赵棣生（80年代初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一起跟着我去老乡家。现在小为离开我们已十来年了，每当想起当时情景，不禁泫然。张贻要生孩子了，我借了一间磨房，把毛驴牵走，打扫干净后放一张小床作为她的产房。另一项任务，是为夜班准备夜宵。1948年12月初，三部已搬到通江口村，因为这里有电灯，并紧挨着西柏坡村和东柏坡村。从12月中旬开始，对外部安排了夜班。当时，三大战役进入决战阶段，每天有重要战报，几乎天天有重要的评论、文章和声明要对外发表。我们上夜班的人经常是通宵工作。廖承志社长每晚亲自来审发英文稿。我每隔三天去赶集一次，买回一点肉、青菜、鸡蛋和挂面。没有切肉刀，就用剪子剪，没有锅就用吃完了的解放区救济总署发的装

五磅奶粉的罐头盒，把肉放在空罐头盒里用炕头取暖用的小火煮上一天。到半夜，才将挂面放进去，这时肉已全烂在汤里，味道好极了。每次打开罐子盖时，同志们都会连声啧啧地说：“好香啊！”廖公本来是吃特灶专门为他准备的夜宵。有一次他喝了我煮的“烂糊面”，就要通讯员把钱领出来交给我，同我们一起吃。

教育科的蓝芸夫要我在业余时间教初中文化课，我答应了。每周两次，我下了夜班，天刚蒙蒙亮，拿了根棍子爬过两三个小山包去印厂教初中化学和代数。听课的人不少，好几十个，有电务处的、印厂的、二科的、校对科的。有一次我在下坡时，看到黑暗中有两只绿色的、像小灯笼似的眼睛在望着我。我心想不好，一面用手中的棍子划圆圈（这是老乡教我的对付狼的办法），一面加快步子前进。后来，听说附近出现豹子，拖走了羊和猪。

没有想到一个月后给我发了70斤小米的钱，作为教课的津贴，我成了对外部的财主了。在赶集时我买了猪脚、猪肝等好吃的请大家打牙祭。那时候大灶一个月才难得打一次牙祭，吃的是红烧肉加粉条。

每天晚饭后，沈建图率领我们沿着小河散步。有一次，廖公有急事亲自到对外部找老沈，我们散步回来时，看到廖公留下的一张便条，写道：“三部，散步也。见条速来见我。”廖公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胡小为常常“咯咯”地笑个不停。她一笑，廖公就说：“母鸡要生蛋了。”他还喜欢画漫画，一有空就在纸上画。据说，进北平后，在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办公时，他还抽空画“公仔”（广东话，意思是卡通人物）。廖公非常孝顺母亲，进城后，我与廖公一家同住西城麻花胡同宿舍。因为我会讲广东话，廖公有时在周末找我去陪何香凝老太太打麻将。何老太太还是一位艺术家，爱好收藏艺术品。有一次我随廖公去锡兰（现斯里兰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议，他把所有的生活费都花在买一个根雕艺术品上，他对我说，这是送给母亲的。

北平快要和平解放了，彭迪、钱行夫妇和英国《工人日报》记

者阿兰·魏宁顿及向立等同志随先遣队去北平。向立是山西人，发音不标准，在电话里传稿时难免让人听错。在传解放军入城式的报道中，群众手拿“小旗”（PENNANT）欢迎，我听成“花生米”（PEANUT）。我反复问了几次，他都回答说不错。就这样，英语广播变成了：北平人民手捧“花生米”欢迎解放军。

口语广播编辑部当时叫二部，同我们紧挨着。梅益、温济泽、左漠野、胡若木等同志常过来聊天。但是，广播台离我们有80多里，设在井陉煤矿附近的大山里。敌人的飞机时常在附近上空盘旋，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的广播台的确切位置。有一天，我接到紧急命令，要我一天内赶到广播台，准备当临时播音员，因为两位英语播音员魏琳、王禹都感冒了，嗓子哑了，而当过播音员的钱行又去了北平。马班长派了一位饲养员跟着我骑马前去。这是我第一次骑马，心里有点紧张。好在老马识途，过河上坡都很平稳。谁知道，近黄昏时，翻过一座山头后前面是一马平川。这匹老马不听指挥，拔腿狂奔起来，把饲养员远远地甩在后面，总有好几里地。我只好夹紧两腿，抱着马颈，听天由命。那马奔驰了半小时，在另一座大山脚下的窑洞口停了下来，原来那是它熟悉的广播台的马棚。我下马后，两腿酸痛，站不直，只能半蹲着走，好久以后才恢复。电台的播音员们，齐越、丁一岚、孟启予、杨兆麟等看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都哈哈大笑。

提起齐越，有一件关于他寻找爱人的事，我要不写一笔，恐怕没有人记得了。齐越去解放区后，他的爱人杨沙林留在北戴河老家。齐越进城后发现她不在老家，不知去向。经领导批准，齐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破天荒地播了一则寻人启事。还真起作用！原来杨沙林已到冀东解放区工作，她听到广播后就找到北平来了。夫妻团圆，不必多说。杨沙林先在对外部工作，后调到图书馆。

还有一件我经手的事，应该提一下。美国人李敦白在对外部改稿已有多年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前的一天，廖公叫我去，要我通知李敦白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廖公的表情比较严肃，我

感到事情有点蹊跷。李敦白一面收拾东西，一面问是否要他参加进城先遣队，我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来了中央社会部的一名干部和两名战士带走了李敦白。我心中的一团疑问，直到晚上看《参考消息》时才得解开。原来，塔斯社发了一个公报，声称著名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是间谍，被驱逐出境。李敦白是通过斯特朗的介绍到解放区的，因此受牵连，受到审查。斯特朗的案子在1955年得到平反，对李敦白的审查也就结束，李敦白被调到中国国际电台英文部担任专家。“文革”中他再次被捕，“四人帮”垮台后才被释放。我在1984年从西安回北京的飞机上遇到过李敦白和夫人，从名片中得知，他当时担任一家美国电脑公司的经理。

1949年初，从白区来了一批民主人士，其中有吴晗教授。我走了十几里路去统战部看望过他。在回来的当晚，接到通知要我为一位刚从白区来的大知识分子安排住处。他叫陈翰伯，可能到对外部工作，当时我不认识他，以为他也是民主人士。他在我的隔壁房间住，半夜里，我听到他忽然走出房门，到外面散步。同我共居一室的邓光担心附近有小河又有山坡，怕他有闪失，要我跟着他。可能他初到解放区，比较兴奋，先沿着河边走，后来又折向北边。我心想不好，再往前走就是西柏坡村了，那里有警卫站岗，夜里戒严，不让走的。我赶忙回办公室，向保卫科打电话通报此事。这场误会成了同志们取笑我的话柄。第二天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久仰其名、经常在上海的《世界知识》杂志上写国际形势分析文章的梅碧华。进城后，他担任新闻学校（原为新华社新闻训练班）的副校长（校长是范长江），后来他调中宣部任理论处处长，后又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

1949年4月初，新华社大队人马由廖公率领乘着十几辆卡车经过石家庄向北平进发。我们在石家庄住了一夜。廖公带着对外部的几个人去拜访市长柯庆施。去前，廖公笑嘻嘻地对我们小声说：“去敲他竹杠，要他请客。”果然，柯庆施买了冰激淋招待我们。在解放区能吃到带有冰碴的冰激淋，是非常难得的。

在去北平的旅途中发生了一次险情。公路上挤满了南下的四野部队，步兵、骑兵、野战军车队不断地浩浩荡荡向南前进。我们的卡车开得很慢，有时公路太挤，卡车从小路迂回。由于司机不认识路，我们乘的一辆卡车离开了大路，走上了一条干涸的河床。“嘎”的一声急刹车，卡车突然停在一座小桥的洞口，车头已卡在桥洞里。黎枚和我高高地坐在最前面，紧靠着车头。我反应还算快，一下把黎枚拖往后仰。她的嘴唇擦破，两颗门牙断了，脸上满是血迹。真险，卡车如果再往前开一点，她的鼻子就可能保不住了。我们只好折回石家庄对她进行急救。经医院诊断，没有其他伤处，她留在石家庄养伤，我们继续往北开拔。由于公路拥挤，车速快不起来，我们在保定又住了一夜，第三天才到北平。

二

在进城之初的几个月中，我不时被抽调或借调去干一些与新闻采编无关的工作。不过，我从中取得了不少办事经验，还认识了不少重要人物，在我以后的采访活动中，他们给了我不少帮助。

搞发行

进城之初，外交部（当时为中央外事小组）、军委等单位都要新华社的英文电讯稿。当时在西单六部口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型印刷厂里印刷出版八开四版的铅印《新华每日电讯》（英文）《Xinhua Daily News Release》。英文排字用的是从上海《大陆报》接收来的老式英文铸造排字机。1949年4月22日出版创刊号，刊登的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的渡江命令，即“向全国进军命令”。

英播部（即现在的对外部）主任沈建图通知我去搞电讯稿的发行。发行怎么搞法，发行对象是谁，一系列问题都得自己动脑筋去解决。我和当时担任英文电讯稿校对工作的周立方（后担任中国新

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商量后,找到北平军管会外事处长柯伯年。他批了一个条子给公安局外事科,把北平的全部外侨名单和地址给了我们。我们俩就按图索骥,骑着自行车满城穿行,一家一户送去电讯稿和订单。第二天就有人来订阅了。

在分送订单的过程中,我们在沙滩附近遇到北京大学的英国教授安普森(Emperson)夫妇。我们曾听过安普森教授讲授莎士比亚作品课。他们请我们喝茶,并分别拿出英国共产党和南非共产党的党员证,表示愿意帮助人民政府工作。另一次,在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遇到美国《北美妇女》杂志记者琴·莱昂丝。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留在北平的外国记者进行工作的问题。几年前,我们在北大学生会工作时就认识了她。她还谈到她所认识的其他留在北平的西方记者的情况,我们当即把这些情况向军管会外事处作了汇报。柯柏年表示这些情况很有用处。柯老是新华社李伍的哥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们一家人在江西有十多口惨遭敌人杀害。柯老后来担任过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和驻罗马尼亚、丹麦等国大使。

接着,我专程赶赴天津,找到了天津外事处长章文晋。经他批准,我又拿到了天津的外侨名单。我向他们寄去了订单。这样,我们有了天津的订户。

上海解放了。华东总分社设有英文部,由杨承芳(后曾担任《北京周报》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所长)担任主任。我本想同英文部联系,打算由他们代为发行。没想到,信还未发出,杨已要调北京工作了。我偶然找到了由一家三口人办的光明派报社。经过批准,我委托他们通过上海的发行网,在上海开展订阅。

一个多月后,我已另有任务,发行工作就此移交出去了。

早期的专家工作

新华社在50年代末才成立外事部(后改称外事局),而总务处设专家科是在60年代初了。在此之前,对外部的专家工作由本

部门负责，好在当时只有对外部有专家。

1948年底，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参加了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劳大后随同总工会领导人刘宁一来到河北省建屏县。他在总社英播部工作了一个时期后，随同新华社的先遣队进入北平，报道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入城式。

阿兰在北平的采访活动常常由我陪同。1949年6月，我送他去天津，乘船经香港回英国，随身带去毛主席写给英共主席波立特的一封信，邀请英共派专家来华工作。英共派出了四人小组来华，史平浩和夫人史珍妮，阿兰和夏庇若。史平浩是一位有地位的英共党员，曾当选为英共政治局委员，他在外文图书出版社工作，1957年患癌症去世。史珍妮在人民画报社工作。阿兰和夏庇若在对外部工作，同时他们还还为英共机关报和刊物撰稿。夏庇若曾担任过英共伦敦的区委书记和英共地方议员竞选委员会负责人。他生在俄国基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反犹太活动掀起高潮，他全家迁居伦敦。四位英国专家在1950年1月初经莫斯科来中国，我赶到满洲里去迎接。

后来我搬到国会街37号宿舍，同英国专家住在一起。先后同住一院的有美国专家艾琳（她从波兰来）和马尼亚（原名罗斯，曾任美共主席福斯特的秘书），还有张报等。

我负责定期向夏庇若、阿兰传达总编室汇报会上的一些重要内部情况。当时四名英共专家加上马海德（卫生部专家）组成学习小组，中联部的专家索尔·阿德勒有时也来参加。我不定期地参加他们的小组讨论会，介绍有关我国政策和情况的背景材料。夏庇若每次都作笔记，准备作为日后写书的资料。没有想到，这些笔记在“文革”中成为他的“罪证”，而我也受到牵连。

阿兰花了不少精力培训对外部的干部。在抗美援朝期间，为了捍卫朝中方的立场、揭露美方的阴谋诡计，他写了大量的报道。夏庇若也在朝鲜后方做被俘英美士兵的工作，为此，他们的护照被英国政府吊销。

阿兰在1957年提出了改进新闻，特别提出对外报道不能完全跟着对内宣传走，他对我们当时的一些政策有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当时是难于被接受的。我们与他展开争论，甚至变相批判。阿兰终于离开中国去民主德国，担任外交部远东问题顾问。1979年，阿兰应中联部邀请到北京访问。新华社举行了招待会欢迎他。我奉命向他表示，当年他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他听后显得很激动。可惜，他回柏林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筹建国际新闻局

1949年7月初的一天，我随新华社副秘书长徐迈进去中南海开会。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国际新闻局的筹备工作。胡乔木同志传达了中央指示，出席会议的人中有范长江、陈克寒、萨空了、韦明（新华社记者，后担任周总理新闻秘书）、马健民（作家杨沫的爱人，后任新闻总署报刊处处长）和刘尊棋等人。这时我才知道，我暂时被借调出来是为了协助刘尊棋筹备国际新闻局。此后几个月我就一直跑东奔西，干我从未干过的工作：调干部，寻找房子，购置桌椅书架和办公用品，起草电报等。

当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刚开过。党中央同民主党派领导人就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组成初步交换了意见。根据这项计划，政务院将设立新闻总署，下辖新华社、中央广播局、国际新闻局和新闻摄影局。新华社的英播部划归国际新闻局，成为新闻处，但对外发稿仍沿用新华社电头。对外英语口语播稿的编辑工作仍留在新闻处，直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成立才回到广播局。

廖承志同志在进城后就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和新华社社长的职务，改任统战部副部长（筹建中央联络部），同时兼任中央广播事业处处长和团中央的领导工作。筹建国际新闻局的工作是由中央广播事业处负责，所以有些重要问题要由廖公来决定。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找房子。新闻总署和国际新闻局的办公室

都设在宣武门国会街26号原北京大学四院的口字楼一层内。解放前，四院是北大一年级新生的大本营。口字楼建于30年代，比四院的其他建筑都要新。除了新华社的总编室外，口字楼二层其余的房间都是总社领导同志的宿舍，三楼原本只有一间大屋，用作小会议室。

国际新闻局还没有宿舍，最早来报到的干部只好暂时住在旅馆里。我骑车到处找房子，首先在国会街找到两处房子，一处是国会街5号的小院子，另一处是国会街37号四合院。5号是用了500袋面粉买下的，37号的房主是投诚的国民党师长的儿子。他开价1500袋面粉，后来以1200袋成交。

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偶然获悉南河沿有几栋空房子出租。我去一看，有四栋中西合璧的房子，建筑质量较高，有的里面还有小游泳池。房主是一对美国老夫妇，叫舒美克（Shoemaker）。他们的儿子在国民党的中航公司当飞机驾驶员。房租高得惊人。每月要几千斤小米，所以一直没有租出去。我向廖公报告了这个情况，他立即决定签约租下来。这些房子后来移交给外交部，有的曾作为外国驻华使馆的馆址和外国通讯社驻京办事处。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一家现在仍住在那里。

南河沿的这些房子还同破获国民党特务联络站一案有关。我偶然发现沿大街的一栋房子里时有不三不四的人进进出出。我怀疑那是地下赌场或是倒卖外汇、银元的地下交易所。廖公听了我的汇报后，要我立即去见北平市军管会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向他当面报告。谭局长下令七处处长冯基平（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带领便衣前去侦查。若干天后，我遇见廖公，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小鬼，你算立了一功，公安局破获了一个敌特联络站。”军管会据此接管了这一批房子，我们当然也就无需再付房租了。

我一面找房子、买办公用具，一面接待、安置陆续到来的干部。局长乔冠华从香港来，他一家住在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中央外事小组的负责人王炳南也住在那里。随同他一起来的有香港

《中国文摘》社的干部。从香港和上海来的一批知名文人学子中不少是我舅父叶灵凤和父亲的故友或同事，也是我的长辈。

廖公给了我一个任务，去找一批懂外文的大学生参加对外宣传工作。不少北大、清华和其他大学的学生已参加了南下工作团。我去东四原“美国学校”里南下工作团驻地（后为外交部所在地）看望他们。经动员后不少人愿意来。我开了一张长长的名单，共二十多人，其中有周立方、张璧华、赵少伟（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和郑葵（当时在人民大学工作）等。没有想到廖公把这张名单分成两半，一半调给国际新闻局，另一半调给他主管的团中央联络部。

有一天下午，我听说汪仁霖刚从香港到北平。我知道他喜欢吃广东菜，于是赶到东安市场，在一家广东酒家里找到他，说服了他参加新闻处的工作。

1949年10月国际新闻局正式成立，我仍回到新闻处，继续当记者。1952年4月，国际新闻局撤消，改组为外文出版社，第一任社长为吴文焘。新闻处又回到新华社，成为对外新闻编辑部。陈龙一度留在外文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沈建图牺牲后，他调回新华社。

陪同《真理报》记者和苏联代办去广州

在我参加的外事活动中有一件事是很特殊的。1949年12月底，我奉命陪同第一个来新中国采访的苏联《真理报》记者去广州。她叫奥尔嘉·契乔特金娜，是《真理报》国际部副主任，曾被派往印尼、马来亚等东南亚国家采访，她四十开外，精力充沛，英语讲得很流利。在前门火车站上车时，我才知道同行的有苏联临时代办齐赫文斯基和他的警卫员。外交部交际科科长韩叙来送行，他交给我一封信带给广州市人民政府，并悄悄地对我说，请照顾一下苏联代办。这样，我成为一名接待外交官的记者。

齐赫文斯基原是驻天津总领事，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苏联

任命的驻新中国第一任大使罗申还没有到任，因此由原驻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任临时代办。他此次去广州是奉命将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的财产移交给我国政府。我们乘的是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的公务车，此车是用来送中南铁道兵司令员兼衡阳铁路局长郭维诚回衡阳的。我们搭乘他的车子。郭司令员曾是地下党员，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也是张的亲信。他在四野进关南下前是四野铁道兵司令，他很风趣、幽默。一路上，他讲了不少解放东北和有关张学良的轶事。

我们沿津浦线南下，经上海时停留了一个白天。上海市军管会外事处有人来迎接我们，送我们去拜会宋庆龄。我很高兴在思南路宋公馆认识了金仲华、刘思慕等新闻界老前辈。

火车在沿刚恢复通车的浙赣线行进时，车子颠簸得很厉害。到衡阳后，公务车要调回北京，我们换乘武昌去广州的普通客车。在离北京时，公安部派了两名警卫随行，郭司令员又加派了两名警卫。

广州是在10月14日解放的。我们到达时才解放了两个多月。被炸毁的珠江桥虽未修复，但整个局面已相当稳定，市场呈现繁荣景象。海关刚恢复工作。我们去参观时，看到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被没收的走私洋烟和洋酒。可是，大街小巷还满地是出售洋货的小摊。一辆全新的英国飞利浦自行车才卖70万元，合后来的人民币70元，一只瑞士表的售价合后来人民币20元。中共南方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对我们说，非但走私一时很难杜绝，防止敌特越境也很困难。他风趣地说：“广九铁路一直在通车，国民党可以一火车、一火车地派进来啊！”

我们住在广州最高的爱群旅馆顶层的套房里，一停电就要爬13层楼梯，真是难为了这几位苏联客人。

我们在广州的采访、参观活动安排得很紧。在移交苏联总领事馆财产的正式会谈和仪式上还由我担任翻译。由广州青年团组织的几千人参加的欢迎会上，我为苏联客人当翻译。我已好多年